



罗高林

罗高林  
著

罗高林 著

罗高林

(修订本)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小平/罗高林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6. 12

ISBN 7-5063-1130-5

I. 邓… II. 罗… III. 诗歌—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3395 号

## 邓小平 (修订本)

---

作者: 罗高林

责任编辑: 水舟

责任校对: 张玉林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mailto:wrtspub@public.bta.net.cn)

印刷: 清华大学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850×1168 1/32

行数: 6000

印张: 9.25

插页: 6

印数: 3001~4000

版次: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1130-5/I·1118

定价: 28.00 元 (精装)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献给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邓小平同志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期间，与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

1956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干部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的报告。

1956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的报告。

195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的报告。

195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的报告。

1957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的报告。

1957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的报告。

1957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的报告。

1957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的报告。

# 为新时代而歌

翟泰丰

长诗《邓小平》是近年来出现的一部难得的好诗。作者用诗的形式，浓墨重彩颂扬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并把他们为人民事业而艰苦奋斗的丰功伟绩紧紧同历史的波澜、同时代的进步、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描写，让我们感受到了伟人的高贵品质与雄才大略，感受到了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强大的气息。正因为如此，我们从这部长诗浩大的长卷气势与独特的艺术魅力中，领略了历史的教诲和史诗的力量。

如众所知，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翻开中国文学史，诗歌犹如串串珍珠闪耀在华夏民族文化的长廊之中。诗歌的成就是巨大的。以《诗经》为先河的诗歌创作，到楚辞，到魏晋唐宋元等代的诗章，及至近现代的新诗革命，我国的诗史长河之中出现过一个个不可磨灭的艺术高峰。究其原因，不能不说

是诗人诗作始终贴近时代，关注变革，关心世事，热爱人民；与时代变革同呼吸，为时代变革而讴歌的结果。到了近些年，我国的诗歌创作从整体上说是健康的，是有起色的。老一辈诗人继续握管放歌，为社会改革与进步擂鼓助阵，创作了一批佳作，成为新时期以来诗歌创作领域难得的财富；而一批诗坛新秀也脱颖而出，努力将个人情感投射于改革开放的火热的现实生活之中，迸放出了不少好的诗作，成为新诗创作中颇有朝气的一代中坚。新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特点，是诗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及探索精神，求新立异，使得诗坛一度显得空前活跃和繁荣。但诗坛也一度出现过津津于灰色情感的发泄，沉迷于文字游戏的现象。为此，在肯定当今诗界成就之同时，也必须看到它们与我国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形势远不适应，从题材上说也不够宽泛，尤其是史诗般的力作还相当匮乏。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努力加以改正。

积极创造健康有益的诗歌创作风气，加强诗歌理论的研究与学习，是诗歌领域繁荣创作克服不足所必不可少的工作。我国诗歌创作有着优秀的传统。从孔子编诗时起，历代诗人在追求艺术的同时，都不忘“文之为德也大矣”。《尔雅·释名》曰：“德，得也，得事宜也。”我的理解得事宜就是指诗歌创作首先要合乎国家、人民的最高利益这一准绳。孔子

也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也即是指诗歌要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这一点，孔子在谈到《诗经》时曾用一句话概括过，曰：“思无邪”。那是相对正而言的，无邪就是要去掉那些颓废的、低级的、庸俗的、落后的诗歌创作倾向和思想。孔子以后，我们不少的先人都都十分注重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并在长期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印证。当然，诗歌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创作的领域也是宽泛的。可以写“小桥流水”，亦可以写“大江东去”，但优秀的诗人总是把手下的笔头看得很神圣、很崇高，把诗与人生的进步、把诗与人格的塑造融合在一起，把人生对历史与现实的肩负、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与奋斗寄寓于诗歌创作之中，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代表主流文学的优秀诗篇总能永恒地在我们耳边缭绕回萦之故。古人云“诗言志”，恐怕更多的是言诗之所在之志，亦即诗人之气度、诗作之宏大及其气势之磅礴等内涵所在之大志，言民族精神之大志，言时代伟人与人民敢教日月换新天之大志。是为情而造文，而非为文而造情也。而今天，我们的人民正在开创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身边有那么多可赞可叹的英雄人物，有那么多令人心旌摇荡、震撼胸魄的崭新事物。饱含激情的诗人，怎么能不为之放声歌唱呢？“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这

就要求诗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与时推移”，更好地同时代、社会、生活水乳交融，休戚与共，这样才能真正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才能为人民所喜爱，也才能创作出真正的惊人大气之作。

目前，就品种而言，诗歌的情形仍是小诗多，长诗少，抒情诗多，叙事诗少，生活小品诗多，时代政治诗少，尤其是政治抒情诗极少。这种情形就使得我们今天的诗坛既是丰富的，又略显单一；另外，诗坛也缺少作为新诗所应有的气势、胸襟与震撼力。我们提倡百花齐放，就是要在群芳争妍之中开放出绚丽多彩的艺术精品，使得我们的诗歌园地既有鲜花飘香，又有掷地有声的反映时代的扛鼎之作出现。单纯经营小品，甚至把写一己琐事视为一种时髦，显然不利于诗歌创作的发展，不利于诗歌园地的繁荣，不利于全面继承和发展我国诗歌的优秀传统，不利于把我国当代的诗歌创作推向新的高峰，也不利于营造产生大手笔及精品力作的良好环境。

提倡多样化，鼓励创作有个性，这与文学的使命感并不矛盾。譬如《诗经》，以往好像多偏重于“风”、“雅”，而少谈及“颂”，而且谈“雅”时也偏重于“小雅”。我觉得这个恐怕与历代的诗论家的偏好有关系。但“风”、“雅”、“颂”终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一个完整的诗学观念。它们代表了古代诗

歌的最高成就。作为“风”、“雅”在发挥诗歌的兴、观、群、怨方面的确具有积极意义，但《诗经》的整体价值就在于“有美有刺”，用今天的话说诗歌首先应该有赞美有歌颂，同时不能没有讽刺与批评，这既是诗歌艺术特征所规定的两个层面，也是诗歌创作对社会生活能动反映的规律之所致。所谓“顺美匡恶”、“教以化之”就有这个意思。我总以为，我们过去对“颂”的研究开发，并给它以新的生命展现得不够，正视得也不够。这可说是一个遗憾。古人云《诗经》以“颂”为先，所谓“四始之至，颂居其极”此之是也。“颂”，在当时虽是为“告神明美盛德”而制作的，但同“风”、“雅”结为一个整体，而“所美所刺，未尝不婉顺而归之于正”；况且《诗经》305篇，论及诗意的精深醇粹，诗境的博大宏远，恐怕要算“雅”（“大雅”）和“颂”了，就是“风”和“小雅”，亦有“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的问题。我以为“雅”（“大雅”）和“颂”值得研究，正是指这些诗篇在倾向上歌颂了开明进步的政德，歌颂了英雄，肯定了发展进步的历史潮流，反映了人民的智慧、热忱和创造力，如《载芣》、《生民》、《公刘》等等就是记载与歌咏了伟人的业绩与功德，描绘了劳动者的朴实品质与生活场景，而成为整个《诗经》中最为动人的篇章。这也就是《诗经》所特

有的本质与价值所在，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全面继承与对待的问题。总之，今天当我们在谈论文学使命感的时候，加强这方面的探讨，对于我们掌握诗歌理论，促进精品力作尤其是长诗史诗的创作与发展，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另一方面，诗歌创作不能脱离时代，不能脱离生活，不能脱离人民，这也是诗歌历史上留下的教训。唐宋以后，有些诗人“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所以，就是像“风”、“雅”这类的诗也慢慢败落了。我们应该总结与记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提倡写精品，尤其提倡创作出讴歌时代变革、反映火热生活、描绘伟大人物与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优秀诗篇，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这就要求我们的诗人不应当仅仅去抚风弄月，作一己感伤之浅唱，而应当首先做到自己是诗人和政治家、诗人和战士的结合，要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深刻的生活见识和宽宏的艺术胸襟，要有抒写长卷力作的气魄。只有这样，“心志正，则道德仁义之语，高雅醇厚之义自具”。我认为，一个真正的文学艺术家，不仅要有良好的文化理论修养，良好的创作审美心态，还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来规范自己，以先进的世界观指导创作，自觉地站在历史的高度，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是

否优秀之作，并不是没有是非标准，古人也有“诗贵先合度，而后工拙”之说。拿到今天，这个“度”，就是要使自己的创作和作品合历史发展主潮之度，合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之度，合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度，一言以蔽之，合中华民族全面振兴之度。合这样的度的自然就是好作品。

在我国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率领各族人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把一个多世纪以来受尽外来侵略欺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有史以来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又一次伟大的革命，坚持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成为伟大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制订了通往2010年的宏伟规划，为实现国民经济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也是光耀千秋功不可没的。用诗

歌以及其它艺术形式反映这一伟大变革时代，歌颂时代伟人的品格、风貌和业绩，表现历史前进中顽强奋斗的中华民族之魂，应当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光荣而艰巨的重任。长诗《邓小平》就是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把邓小平同志作为集中刻画的艺术形象，并以艺术的笔触，真实而可信地铺陈了中国革命的漫长道路，展示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美好生活的历史画卷。这部长诗结构宏大，语言鲜明，基调高昂，注意运用形象思维，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领袖们既是伟大的又是平凡的，既是坚韧不拔的又是感情丰富的，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他们的品格与性格本身就是我们精神宝库中难得的财富。从这个角度说，长诗《邓小平》在思想表达和艺术创造上都是成功的。

江泽民同志在视察八一电影制片厂时指出：“在现阶段，文艺要反映人民生活的本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好务，就要努力反映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反映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伟大时代精神。这应该成为包括电影在内的整个文艺事业发展的主旋律。”弘扬主旋律应该是我们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文艺创作领域的主流，也是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肩负起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方面，长诗《邓小平》的作者以他的艺术实践尝试了这一历史任务的辛劳与

欢乐，这也是我所以要为之高兴并欣然作序的原因。我衷心地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讴歌时代、讴歌人民、讴歌领导和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伟人的优秀作品，奉献给时代，奉献给人民，奉献给华夏文化的艺术宝库！

我知道 在今日中国  
这三个字所包含的意蕴  
我知道 在人民心中  
这三个字所显示的内容……

——摘自一位诗人的日记

# 第一章

一位工厂文学青年向我说，厂里举办团员文学周活动，搞了一次关于“领袖诗”的朗诵。这时他们才发觉，领袖人物中，描写邓小平同志的诗竟是那样难觅……

